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

主编 纪宝成

执行主编 黄朴民 梁涛

國學



近代国文研究

陈伟文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与近代国文研究/陈伟文 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07-5217-0

I. ①国…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276 号

出 版 人:郑纳新
责任编辑:止 善
封面设计:李星星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169862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8.75 字数:27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纪宝成

执行主编

黄朴民 梁 涛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立天 冯其庸 庞 朴 张岂之 张立文 李学勤 傅璇琮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干春松	马克锋	王子今	王炳华	乌云毕力格
纪宝成	孙家洲	刘笑敢	吴 光	陈 来	陈启云
杨庆中	沈卫荣	孟宪实	徐 飞	袁济喜	梁 涛
黄朴民	黄克剑	诸葛忆兵			

总 序

纪宝成

一

本世纪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所引发的“国学热”，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国学既是“国魂之学”也是“学科之学”。

对于何为国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内容而言，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最常见的看法。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等于传统学术，而是近代学者受西学的刺激，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学术的研究、整理，它强调的是世界眼光、现代意识。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学”，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的是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它与古代“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我们看来，这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国学研究总是要以以往的历史为对象，离开了传统学术，国学研究就成了“无米之炊”，国学也就不成其为学了。但我们今天研究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为指导，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一种“重构”。从知识上来说，今天的国学应该是更有体系、更有条理，更符合现代学科的要求。同时它又是“国魂”之学，应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

近百年来，由于中华民族遭受到一系列屈辱与挫折，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未来遭抹黑，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是

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几千年连续不断、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及其价值体系,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等,在战胜外来列强,赢得民族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腾飞和崛起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比拟的作用。一个人没有灵魂,只能是行尸走肉;一个国家没有魂魄,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破”的话,我们今天则是要在“破”的基础上着眼于“立”,继承传统国学的优秀、活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重塑“国魂”,再造中华文化的当代思想体系。“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我们视国学之为“国魂之学”,是因为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强大自信心的精神源泉。只有国学才可以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世界“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国学才能客观地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真实状况,说明影响和决定国人行为的内在体系,以及它如何有效支持国家“硬件”的运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是“国学热”,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热”?这最好不过地说明,国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重振国学是顺乎天,应乎时,合乎民。当我们一些学者纸上谈兵,喋喋不休地质疑国学的合理性时,广大群众却早已回归国学、接受国学、热爱上国学,因为国学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处事原则,他们需要国学,离不开国学。我们相信,随着国学研究和普及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

“国魂之学”意义上的国学可以是广义的,主要表明了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凡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包括文史哲的学者,只要是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抱有弘扬的态度,都可归于国学的旗帜之下。从这一点讲,国学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可以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或者是纯粹整理国故的心态。而国学研究则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一种强烈的弘道意识。从事国学的人虽然也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进行批判,但其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是为了弘扬、重建中华文化。因此,国学的提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重大。它既是对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精神的响应,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学的需要,同时还在广大人文学者中形成一股凝聚力,树立起一面旗帜,将大家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二

国学不仅是“国魂之学”，同时也是学科之学。作为“国魂之学”，国学可以是广义的，具有旗帜、统合的作用；而作为学科之学，国学又是具体的，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内涵和课程设计，处理好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哲的关系，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国学本是个世纪初一些学者为保存我国固有学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面对西学的强势地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如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又纷纷接受、采用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对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分类，一般分为文、史、哲，加上语言、文字、民俗、考古等。这样国学就成为一个过渡阶段，逐渐让位给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不可否认，当时人们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有其合理性，文、史、哲等学科在传承古代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对文、史、哲的现代学科进行反思，检讨其中的问题和弊端。如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汇通之学，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将其放在“西学”的学科门类之下，必然是削足适履，摆脱不了肢解“国学”之弊。例如，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在文、史、哲的学科体制下，《诗经》变成文学，只能探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诗经》中的鸟兽虫鱼，而三家诗、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而恰恰是这些经书，在历史上曾经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由于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这难免使人发出“数典忘祖”之叹了。还有，子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古代诸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包含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丰富的内容。与经学不同，子学不是对经书的诠释、解读，而是通过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见解及社会改革的方案，故子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内涵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个性魅力的部分。但在目前的教育中，子学被分割到文史哲不同学科之中，文学系将《论》《孟》《老》《庄》当文学作品看待，探讨其艺术风格、文体演变；哲学系则将其看做儒、道的哲学经典，研究儒家、道家的思想发展；历史系则将其当史料看待，钩沉其中的人物、事件，结果只能是得其一偏，难窥其整体之美，完整的子学被活活肢解。

其实，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西方看成是现代学科的典范，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西方除了文、史、哲的学科外，还设有古典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做整体、综合的研究。这说明，中西古代文化具有相似性，它们都亦文亦

史亦哲,都具有圆融、整全的特点,不可做简单的分科研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学科,采取综合式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其堂奥。国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古典学相似,都是对文、史、哲分科的一种补充,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史、哲学科中的内容,如经学、子学等,一种整全的研究。

现代教育有一个综合、交叉的趋势,我们不否认文、史、哲分科的合理性,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应有新的综合,国学学科的设立,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其实文、史、哲本来就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这样讲,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应该有综合。但分科既已形成,想要综合已非易事,故海内外许多高校都设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之类的机构,目的就是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交流提供一个平台。我们认为,设立国学学科,成立国学院,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有国史、国文等专业,但它与历史系、文学系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专业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更强调经史、文史的会通,打破学科的壁垒,真正继承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所以国学学科一是可以弥补文、史、哲的不足,避免对传统学术的肢解、割裂之弊,二是可以促进文、史、哲的沟通与融合,使其真正做到“不分家”。

总而言之,文、史、哲等学科贡献很大,必须肯定;现行的学科体制存在弊端和不足,有必要改革、完善。而设立国学学科,正是改革、完善现有学科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

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国学的发展经过了几次高潮,其间的起起伏伏,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我们将几次国学运动中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为现代学术、民族国家、经学、子学、国文以及焦点争鸣等题目,编写这套“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这套丛书虽然只是资料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了编者对国学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就曾学习、借鉴以往国学机构的经验,国学先行者的实践是我们一份宝贵的财富,继承并超越前人乃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要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发展,并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国学,支持国学,使国学事业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添色增光。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

引言

陈伟文

中国传统学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反映了古人对学科的认识。主要保存在集部的国文,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有学者进行专门的整理和研究,并形成以校勘、注释、批点、辑佚为基础的方法体系。关于国文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则主要表现为诗话、词话、曲话等注重直观感悟的随笔式作品。传统的国文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也取得很大的成就。

清末以来学术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伴随着鸦片和大炮进入了国门,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留学,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和理论,接受新方法的训练。西方学术对传统价值观和观念造成重大冲击,人们把区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传统学问称之为“国学”。一些接受西学影响的学者回国之后,用新思想、新方法来进行国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最终促成了学术研究的近代化。以国文研究而言,近代学者用新的方法去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触及的问题,尤其是国文中的某些领域,比如带有纯文学性质的戏曲、小说,由于长期被传统士大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因此研究者甚少,堪为典范的研究著作更是寥寥可数。直到近代,学者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新的突破,重新认识国文的功用,界定国文的范围,才促进了国文研究的大步发展。此后一百年的国文研究思路和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向前走。尽管今天看来,有些观点、结论已被否定,但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没,而要探讨往后国文发展的方向,也应该有正本清源的认识。因此,本书胥举民国时期国文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分为国文总论、诗词研究、文章研究、戏曲研究和小说研究五部分,向读者介绍国文研究近代化初期的理论和方法。

国文总论部分主要探讨文学的本质。在古代传统士大夫的认知中,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亦即用来经世治国、名垂千古的工具。虽有描写人性弱点、私隐情感的作品,作者却常常秘而不宣,或干脆嫁名于他人。在他们用来传世的著作中,对这类作品更是万分忌讳,致使后人连有些书的产生时代都弄不清楚。近代学者对文章的性质和功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后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相继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因为文学的目的是为人生,那么以往或当前产生的描写人生体验的作

品,不管它是否雅致,都具有研究的价值。梁启超也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为人生的具体方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足以代表其理论的高度。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熏也者,如入云烟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而为其所染”;“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刺也者,刺激之义也。……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出于为人生的目的,对小说的审美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

随着对国文本质、功用认识的转变,近代学者对传统国文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和反思,同时在多方面试图有所突破。本书分别列举诗词、文章、戏曲和小说研究中堪为典范的论文,总结其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传统学术中的集部研究主要集中在辞赋和诗词两方面,偶尔也涉及散曲,但小说和戏剧向不为人重视。新文化运动推翻了经典地位以后,在国文研究领域,学者们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平民大众的文学形式——小说和戏曲。1924年鲁迅在西安大学开设小说史课程,并写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梳理了古代小说发展的历程。后来他又撰写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从而开创了小说史研究的先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运用丰富的材料,细致地论述了古代戏曲的形成、发展过程,对戏曲的各种门类“究其根源,明其变化之迹”,并总结出富于启迪性的理论,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吴梅《曲学通论》中分曲原、宫调、调名、平仄、阴阳、作法上、作法下、论韵、正讹、务头、十知、家数等十二章,科学而系统地论述了古代的曲律,远远超越了明清曲律的研究水平,遂使曲学研究成为国文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二是理论的突破。严格地说,清末之前的学术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探讨,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后,学者开始在国文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严密逻辑推导的能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拈出“境界”二字,以有无境界来鉴别词的优劣,又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以此来鉴别有境界之词的优劣,可谓抓住了词的审美本质,是对传统词论的重大突破。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隐约可以看到西方主体论思想的影子,但这部书依然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只能说是“旧瓶装新酒”。在另一篇文章《〈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的文学理论拿来主义更加明显。他首先用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分析了人性的“欲”是造成苦痛的根源,一部《红楼梦》就是“以生活为炉,以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宝黛悲剧的来源在于人物之位置及关系,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因此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并进而指出,这种特质造成了其美学风格为壮美多于优美。这篇文章较之传统《红楼梦》评点式研究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从而引导《红楼梦》研究走上新的道路。

三是方法的革新。以文章学研究为例,清代文章学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姚鼐曾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具体内容是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

理。这是他们的文章创作思想,同时也是鉴赏、评价历代文学的标准尺度。近代以来,学者摆脱了清代文章学的束缚,运用新方法、新材料对文章进行研究。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就使用他独创的“史诗互证”方法,考证了庾信写作《哀江南赋》的年月,南北朝后期周、陈两国使节交通的背景,指出赋中的哀怨之词乃是庾信屡失南归机缘,失望而发,赋中的用语,实是“用古典以述今事”。从这个角度读《哀江南赋》,无疑能够对庾信的遭遇和心境有更深的理解,对赋中的情感有更真切的体会。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对传统“诗原如画”、“诗画一律”的原理提出异议,认为中国的诗和画各有南宗和北宗,画坛的正宗是南方神韵性灵一路,诗坛的正宗是北方雄浑朴拙一路,并引进西方艺术风格比较,指出诗和画属于不同艺术形式,其表现方式不同导致了表现力也不同。

尽管近代学者不断地否定和突破传统,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出生于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经典教育,因此,这朵易代之际开出的学术花朵,实际上还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例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从自然气候、山川形势和各地风俗习惯的差异,讨论南北方不同文学风格形成的根由。其思想可以追溯到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应劭《风俗通义》等书对各地山川形势、人物风俗的论述,以及魏晋时期对南北方人物的品评。厘清地域文化研究的脉络,就可以看出刘氏从地域差异讨论南北方文学的差别,乃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深化。

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方法也有所继承。例如,清代学术中的考据方法,在近代国文研究中就有很好的运用。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总结传统红学“索隐派”的三种主要观点,批评其牵强附会的弊病,进而稽考各种史料,对曹氏家世、曹雪芹个人遭遇进行考证,分析《红楼梦》中所载人物故事以及故事发生的背景,与曹氏家族、曹雪芹个人经历进行对比,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为“新红学”研究指示了方向。此外,近代学者还善于将实证的方法与西方逻辑推演相结合,从纷繁复杂的文献材料中寻绎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线索,这也是对乾嘉考据学的发展。

当然,清末民初的国文研究处于近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如为了树立平民文学的旗帜,而对传统士大夫创作的雅文学片面否定,不免矫枉过正,影响了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又如在运用西方思想方法的时候,也偶有生搬硬套的弊病。但总的来说,成就是主要的。近代国文研究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必经阶段,有所选择地继承和扬弃,才能从历史的土壤中吸取更多养分,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本书编录的文章尽量选择近代国文研究中具有思想创新或方法创新的代表性作品,但由于学力有限,见闻不广,选择失当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批评。

—目录—

总序	纪宝成	1
引言	陈伟文	1

一、国文总论

文学总略	章太炎	3
南北文学不同论	刘师培	8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傅斯年	13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郑振铎	17
《白话文学史》引子	胡适	32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	35
中国文学改良论	胡先骕	42

二、诗词研究

人间词话	王国维	47
两宋词风转变论	龙榆生	58
论寄托	詹安泰	73
宫体诗的自赎	闻一多	85
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锺书	92
论宋诗	缪钺	110

三、文章研究

文章源始	刘师培	121
读《哀江南赋》	陈寅恪	125
说文笔(节选)	逯钦立	130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	郭绍虞	142
古文四象论述评	朱东润	147

四、戏曲研究

宋元戏曲考(节选)	王国维	161
曲学通论(节选)	吴梅	178
宋金元戏剧搬演考	钱南扬	182
说“傀儡”	董每戡	191

五、小说研究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211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	214
《红楼梦》考证	胡适	228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	253
《水浒传》旧本考 ——由明新安刊大涤余人序本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	孙楷第	272

一、国文总论

文学总略

章太炎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彪，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彪，有馘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彪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彪。《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儒林列传》此宁可书作彪彰耶？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彪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为彪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彪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彪，是故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彪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旬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准此，文与笔非异途。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摭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

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

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范晔自述其《后汉书》曰:“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哀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抱朴子·百家篇》曰:“陕见之徒,区区执一,惑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均龙章于素质。”斯可以箴矣。《世说·文学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裴颇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辞精富。”此即《崇有》二论也。《世说》又言:“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道林语,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庄子·渔夫篇》,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是皆名理之言,诸子之鼓吹也。而以精富才藻为目,足知晋时所谓翰藻,正在此类。且沉思孰若庄周、荀卿,翰藻孰若《吕氏》、《淮南》,总集不摭九流之篇,格于科律,固不应为之辞。以文笔区分,《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宁独诸子?若云文贵其彪邪,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有韵文中,既录汉祖《大风》之曲,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有愁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昂为主,独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以自立者也。《晋书·乐广传》:“请潘岳为表,便成名笔。”《成公绥传》:“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张翰传》:“文笔数十篇行于世。”《曹毗传》:“所著文笔十五卷。”《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策谥议皆珣所草。”《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详此诸证,则文即诗赋,笔即公文,乃当时恒语。阮元之徒辄谓俚语为文,单语为笔。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俚语邪?

近世阮元以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繇,占繇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盖人有陪贰,物有匹耦,爱恶相攻,刚柔相易,人情不能无然,故辞语应以为俪。诸事有综会,待条牒然后明者,《周官》所陈,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礼经》、《春秋经》、《九章算术》者,虽欲为俪无由。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各任其事。舍是二者,单复固恣意矣。未有一用单者,亦未有一用复者,案宋代以来,官文章者皆谓俚语为俚。阮氏之论亦发愤而作也,不悟宋人俚语亦自不少,苏轼《上皇帝书》,其著者也,曾巩《战国策序》、《移沧州疏》,其间俚语,与齐梁人不殊,下者直如当时四六矣,其它类此者众。盖非简策之书而成单语者,世所鲜有。顾张弛有殊耳。文之名实,未在是也;所以为古今者,亦未

在是也。或举《论语》言辞达者，以为文之与辞，较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题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曲说云尔。大史公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矣。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艺文志》言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文章者，谓经传诸子，迁、固所称，半非耦俪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韵文，亦多俪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其旧题，不曰“楚文”，斯则韵语耦语亦既谓之辞矣。《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以为赋邪？《惜誓》载于《楚辞》，文辞不别。以为奏记条议？适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以是见韵文耦语，并得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部署，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于口记，不烦纪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积句，是则耦丽之体适可称职。乃如史官方策，有《春秋》、《史记》、《汉书》之属，适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则分。诸在无韵，史志之伦，记大傀异事则有感，记经常典宪则无感，既不可齐一矣。持论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称其志，未足以动人。《过秦》之伦，辞有枝叶，其感人顾深挚，则本之纵横家。然其为论一也，不可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且文曲变化，其度无穷。陆云论文，先辞后情，尚繁而不取悦泽。《与兄平原书》此宁可以一概齐哉？就言有韵，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风》、《雅》、《颂》者，盖未有离于性情，独赋有异。夫宛转佻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诫，若荀子《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或写都会、城郭、游射、郊祀之状，若相如有《子虚》，杨雄有《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左思有《三都》，郭璞、木华有《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亦动人哀乐未也？其专赋一物者，若孙卿有《蚕赋》、《箴赋》，王延寿有《王孙赋》，祢衡有《鹦鹉赋》，侔色揣称，曲成形相，嫠妇孽子读之不为泣，介胄戍士咏之不为奋。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端论。又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偷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眇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凡好学者皆然，非独仲尼也。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